

莼鲈之思

——在华圣母圣心会士以比利时教堂为参考的建筑设计

Nostalgia

——Scheutists design referring to Belgium

文 / 罗 薇 Thomas Coomans
Luo Wei

作者简介
罗 薇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历史与理论 博士
Thomas Coomans 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

ABSTRACT

比利时圣母圣心会（C.I.C.M.），也称司各特修会，自1865年进入中国，在中国长城以北进行传教活动，时间长达90年之久(1865–1955)。1900年义和团运动结束之后，活动最为频繁，他们展开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但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座教堂在中国内战(1947–1949)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幸免于难。通过大量的档案收集和实地考察，将比利时传教士在华建造的教堂与他们的祖国——比利时的教堂进行比较，看传教士们如何弥补他们的思乡之情。

Belgian 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I.C.M. or Scheut Fathers) entered China in 1865, and they were very active beyond the Great Wall, had stayed in China for ninety years (1865–1955). After the Boxer Uprising, they built a lot of churches in the apostolic vicariates, only a few of them survive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7–1949)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 survey and field work, I collected sufficient material,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Scheutist churches and their home-country churches, and to see how they could mimesis those design.

KEY WORDS

圣母圣心会教堂建筑，中世纪案例，模仿
Church building of C.I.C.M., Medieval example, Mimesis

圣母圣心会——为中国而成立的修会

建筑史学家总是试图辨认特殊类型的教堂以及它的风格所表现的各自修会的特征。一个新的宗教组织在成立的最初几十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逐渐发展并确定了风格和特征，尤其是建筑的风格。他们的“祖屋”通常也就他们的第一座教堂，作为权利、管理以及教育的中心，往往是将来建筑发展方向的参考。并且，修会创始人通常也会埋葬在这座教堂里，从而使得这里成为朝圣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方济会在Assis的教堂以及耶稣会在罗马的教堂(the Gesù)，圣徒方济各和罗耀拉分别埋葬在这两处教堂里。这两座教堂的设计风格迥然不同，却影响了成百上千个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教堂，使得修会的特征很容易被识别。¹

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I.C.M.), 也称之为司各特修会(Scheut fathers or Scheutists), 由南怀义神父(Théophile Verbist)²于1862年成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此后，罗马将广阔的蒙古地区指派给这个修会。义和团运动之后直到1920年代中期，是圣母圣心会的巅峰时期，由于清政府的赔款以及教友的大量增加，修会发展迅速，在这期间建造了大量的西式教堂，而它们的建筑设计和风格都来自传教士的祖国——比利时。和羹柏(Alphonse De Moerloose, 1858–1932)³神父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出身于建筑世家，并且在进入修会之前，就读于根特

的圣吕克建筑学校，学习建筑设计。1900年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接到一系列建筑项目委托，其中有主教府、教堂、小礼拜堂以及修道院等等。和羹柏神父还接到很多其他修会的委托，比如耶稣会、遣使会、熙笃会等。直到1929年回到比利时，他始终忠诚于圣吕克学校的建筑宗则和思想体系——弗兰德斯、理性的、哥特式砖石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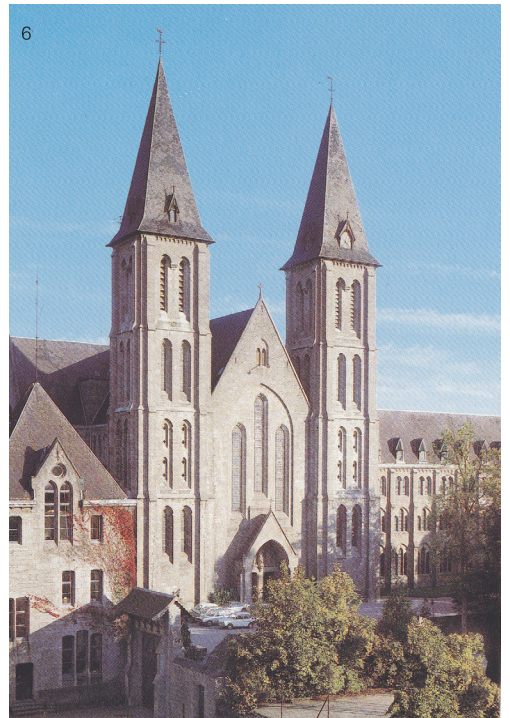
本文针对圣母圣心会的在华教堂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圣母圣心会士是否在中国建了一种特殊风格的教堂，使得它在众多的修会教堂中可以被识别出来？根据建筑的象征主义方法，本文将重点集中于形式和风格的讨论，而不是营造技术和礼拜仪式，试图理解圣母圣心会采用的欧式风格建筑对于中比文化交流的意义，解读圣母圣心会在华教堂与它的参考教堂之前的关系，以及这种模仿背后的深层涵义。

哥特式风格的兴起

圣母圣心会在华的最初几十年，生活在长城以北的偏远地区，气候及自然环境都非常差。传教士们居住在搭建的简易房屋或者窑洞里。义和团运动时期，大量的教会建筑遭到拳民袭击，许多教会建筑被捣毁，教堂被焚烧。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教会通过交涉得到清政府的赔款，之后的20年间，成为教会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最繁荣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那些幸存下来的传教士和教友们积极性非常高，他们建起西方风格的教堂和高耸

的钟楼来彰显自己的胜利。

圣母圣心会士，尤其以方济众主教(1845–1924)为代表，作为中蒙古宗座代牧的他，带领大家抵抗了义和团拳民，此后，成了教会里活着的英雄。他在1898–1920年间管理整个中蒙古地区，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建设者。方济众在布鲁塞尔总部作圣母圣心会总会会长时，修建了司各特（Scheut）初学院的侧翼，它是总部的第一座弗拉芒哥特复兴式或者说布鲁日风格的建筑。⁴方济众神父被任命为中蒙古宗座代牧之时，恰巧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前。主教决定为修会建一个建筑群，其中包括宗座代牧的住宅、管理办公室、神学院的教室、学习室、餐厅、修士宿舍、教师宿舍和一个礼拜堂。方济众主教根据自己对建筑的经验和他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选择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建筑。他最终找到了和羹柏神父能够设计理性的哥特式建筑，并且有中国组织工匠施工的经验。1885年和羹柏神父来华后，被派遣到甘肃宗座代牧区开展传教工作，零星地做一些建筑或室内设计的工作。1899年2月，和羹柏神父被方济众主教从甘肃调来中蒙古，并接受西湾子神学院的委托。这个神学院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建成，典型的比利时哥特式复兴风格，一座西式理性主义的复合体建筑，带有三个平行的二层楼高的侧翼，没有中国式的院子和屋顶(图1.和2.)。神学院的礼拜堂是中间的一翼，端部是带有哥特式花窗格的高窗，最明显的一种的哥特式元素，表达了1900年前后圣母圣心会作为天主教的和比利



时的权利及身份特征。在比利时当地，至今仍能找到许多建筑与西湾子神学院非常相似，尤其在布鲁日地区（图3.和4.）。

哥特、天主教和比利时人在中国

和羹柏神父曾学习过的根特圣吕克建筑学校，是一座艺术和手工艺学校，由天主教教宗绝对权利主义者成立于1862年，成为正统的学院式艺术院校的对标。⁵根据英国建筑师奥古斯都·普金的理论，圣吕克学校推崇哥特式为真正的艺术，并且是唯一可能的基督教艺术，⁶被Jean-Baptiste Bethune男爵——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进一步强化。通过传播一种能够表现天主教真理的风格，圣吕克学校的艺术家成为在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中天主教的十字军。⁷这种非常激进的办学理念刚好应了当时天主教教宗绝对权利主义者与当政的、反教权的、自由党派的交战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圣母圣心会和圣吕克学校都成立于1862年。

被方济众主教拣选且由和羹柏神父设计的圣吕克哥特式风格建筑成为圣母圣心会在中国的标志。和羹柏设计建造的、新的“后义和团运动”建筑都是同样的哥特式风格，但是他们的尺度从小的、单一正厅的礼拜堂到带侧廊的教堂，从带十字形翼部到不带侧翼，从没有钟塔到有一个钟塔甚至两个。由于有太多的教堂需要同期建设，和羹柏神父有时候用同样设计的方案在不同的地方盖教堂，如舍必崖和高家营子教堂。⁸同时，这种简单的小礼拜堂也与比利时的乡村及城市小教堂最为相似。圣母圣心会的神父不是仅仅建哥特式风格的教堂，他们在其他类型新建建筑上采用了很多比利时哥特式建筑的元素，这些元素都是和羹柏神父在建设教堂过程流传出去的，如阶梯状的山墙、十字窗、布鲁日开间、羊皮卷饰板的门、铁艺锚固构件等等。自此，来自比利时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已

经不仅仅表达着思乡之情，更是传教士们作为真正的神的侍奉者的象征。此外，圣吕克哥特式建筑也是比利时民族特征的重要体现。通过参考民族历史辉煌时期的建筑模式，19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合情合理地成为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延续。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种特殊的国家历史风格。在比利时，反教权的自由党和天主教党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导致比利时有几种国家风格。自由党推崇16世纪弗拉芒文艺复兴式风格，因为它是人本主义的表达，然而天主教党派推崇15世纪弗拉芒哥特式风格，因为它是布鲁日的象征——Jan Van Eyck、Memling等弗拉芒艺术家生活的、理想化的、天主教中世纪小镇。在那个时代，弗拉芒这个词指代的是整个比利时，而不是如今的几个比利时北部省份。因此，中国的圣吕克风格建筑不仅表达了天主教的特征，更是弗拉芒比利时在内蒙古的标志。作为一个为中国而成立的修会，他们坚持的宗教和民族特征，都有别于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在华建筑。

这种建筑的和意识相态上的连贯性成为了西方传教士世界观的基础，这种民族的哥特式风格从1900前后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羹柏神父于1909年离开了圣母圣心会，随后隶属于北京宗座代牧区，在服务其他修会期间，仍然钟爱哥特式建筑。和羹柏神父在双树子为遣使会设计了一座带有双塔的教堂（图5.），非常不幸的是，这座教堂在2009年修缮时失火，整个教堂除了双塔外其余部分被完全拆除。与之对应的案例是，圣吕克学校的创始人之一Jean-Baptiste Bethune在比利时Maredsous（1881年建成，图6.）设计的一座双塔立面的教堂。在内蒙古，其他的传教士艺术家也设计建造了比利时哥特式建筑，但是与和羹柏神父的纯粹的哥特式风格还有一

1 | 西湾子神学院（KADOC， C.I.C.M. Archives, folder 17.4.7.1.）

2 | 西湾子神学院礼拜堂（KADOC， C.I.C.M. Archives, folder 17.4.7.1.）

3 | Minnewater诊所的礼拜堂和侧翼，布鲁日（罗薇拍摄，2011年12月）

4 | Minnewater诊所快照，布鲁日（Google Earth, 2011年12月）

5 | 双树子教堂，河北省（KADOC， C.I.C.M. Archives）

6 | The abbey of Maredsous (1872–1890), 比利时（明信片扫描）

定的距离。在很多案例中，他们的比利时中世纪参考非常明确，甚至可以说是模仿了他们家乡的建筑。

其中最令人惊异的就是巴拉盖的钟塔，一个真正的弗拉芒式钟塔曾是整个天主教村落里最重要的建筑(图 7.)。这个钟塔建成于1918年，作为感恩奉献给圣心，因为他在一场瘟疫中拯救了整个村子。这座塔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就像弗兰德斯地区平坦的海滨城市的塔一样。巴拉盖钟塔的参考案例是布鲁日钟塔的上半部分，一个非常典型的比利时中世纪砖塔(图8.)。

1922年，圣母圣心会决定在天津建一个学习中文的地方和财务管理处时，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比利时的哥特式风格建筑。⁹天津，中国当时的第二大港口城市，在众多的租借地中，圣母圣心会的神父们并不是向中国人坚持自己的风格，那些十字窗户、阶梯型山墙和哥特式礼拜堂，是向其他的殖民国家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图9.)。

小结

模仿、莼鲈之思和意识形态是1900–1920年代圣母圣心会在华建筑的三个重要意义。方济众主教与和羹柏神父在促进和传布圣吕克学校哥特式建筑风格过程中，功不可没。在这二十年间，哥特式风格是这个比利时修会在中国表现自己建筑特征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建筑的连贯性自1920年代末逐渐消失。因为罗马天主教会开始提倡“本土化”，不仅仅在中

国，而是世界各地。这项运动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艺术和建筑。于此同时，哥特复兴式风格在比利时也不再成为时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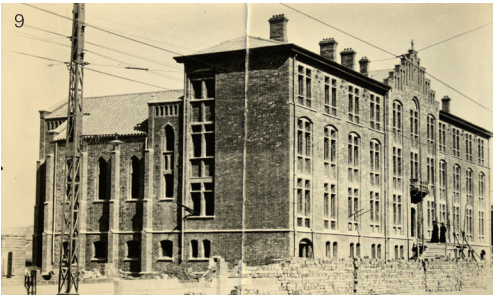
注释

[1] COOMANS Thomas & LUO Wei, “Mimesis, Nostalgia and Ideology: Scheut Fathers and home-country-based church design in China”, in: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 (Leuven Chinese Studie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南怀义 (Th éophile Verbist) 1823年6月出生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并在马林小神学院和大神学院学习神学。1847年9月18日，他晋铎为神父。1853–1855年布鲁塞尔军校指导神师。同时，在布鲁塞尔的“Soeurs de Notre Dame”听告解神师和主任，并在这个修女会的小圣堂宣誓成为传教士。Verhelst Daniël & Pycke Nestor (eds.),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2–1987: History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Scheut/ Missionhurst) (Verbistiana, 4) [M],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5。

[3] 和羹柏 (Alphonse De Moerloose)，1858年1月11日出生于比利时Gentbrugge，1932年3月27日卒于比利时Schilde，1884–1885年初学，1884年晋铎，1885年派遣来华，圣母圣心会最重要的传教士建筑师，在中国设计建造了大量的教堂。VAN OVERMEIRE Dirk (ed.), 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Elenchus of C.I.C.M. in China [M],台湾:见证月刊杂志社，2008，p.124。

[4] Leuven, KADOC, Archives C.I.C.M., photos series 3;



7 | 巴拉盖钟塔 (KADOC, C.I.C.M. Archives)

8 | 布鲁日钟塔，建于13–15世纪 (罗薇，拍摄于2008)

9 | 圣母圣心会学校及财务管理处，建于1922年 (Mission de Scheut, 1923, p. 208)

Missions en Chine et au Congo, 1893, p.183.

[5] Jan DE MAEYER (ed.), De Sint–Lucasscholen en de Neogotiek 1862–1914 (Kadoc studies, 5), Leuven, 1988.

[6] 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 The True Principles of Pointed or Christian Architecture, London, 1841.

[7] Jan DE MAEYER, “The Neo–Gothic in Belgium. Architecture of a Catholic Society” , in: Jan DE MAEYER & Luc VERPOEST (eds.), Gothic Revival. Religion, Architecture and Style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14 (Kadoc Artes, 5), Leuven, 2000, p. 29–34.

[8] Thomas COOMANS & LUO Wei, “Exporting Flemish Gothic Architecture to China: Meaning and Context of the Churches of Shebiya (Inner Mongolia) and Xuanhua (Hebei) built by Missionary–Architect Alphonse De Moerloose in 1903–1906” , Relicta. Heritage Research in Flanders, 9, 2012, p. 219–262; LUO Wei,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Church Types in China: The Churches of the Scheut Missions beyond the Great Wall, 1865–1955, PhD dissertation, KU Leuven, 2013, p. 140–149 and 375–381.

[9] Leuven, KADOC, Archives C.I.C.M., photos’ series 25.1.9 and 26.7; Missions de Scheut, 1923, 208; Daniël VERHELST & Nestor PYCKE (eds.),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2–1987 (Verbistiana, 4), Leuven, 1995, p. 188–189.

参考文献

[1] COOMANS Thomas & LUO Wei, “Mimesis, Nostalgia and Ideology: Scheut Fathers and home-country-based church design in China” , in: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 (Leuven Chinese Studie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COOMANS Thomas & LUO Wei, “Exporting Flemish Gothic Architecture to China: Meaning and Context of the Churches of Shebiya (Inner Mongolia) and Xuanhua (Hebei) built by Missionary–Architect Alphonse De Moerloose in 1903–1906” , Relicta. Heritage Research in Flanders, 9, 2012, p. 219–262.

[3] DE MAEYER Jan (ed.), De Sint–Lucasscholen en de Neogotiek 1862–1914 (Kadoc studies, 5), Leuven, 1988.

[4] Günter BANDMANN, Early Medieval Architecture as Bearer of Meaning, New York, 2005.

[5] PUGIN 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The True Principles of Pointed or Christian Architecture, London, 1841.

[6] Richard KRAUTHEIMER, “Introduction to an ‘Iconography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 ” ,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5, 1942, p. 1–33.

[7] Verhelst Daniël & Pycke Nestor (eds.),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2–1987: History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Scheut/ Missionhurst) (Verbistiana, 4) [M],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8] VAN OVERMEIRE Dirk (ed.), 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 Elenchus of C.I.C.M. in China [M],台湾:见证月刊杂志社，2008.

[9]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56, 1924.

[10] Mission de Scheut, 1923.

[11] KADOC, C.I.C.M. Archives.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Religion, Culture and Society, 宗教、文化及社会研究与档案中心)